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布最新研究成果

古代中国进入王朝时代前，还存在一个古国时代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代睿）在《史记》记载的夏商周三代之前，古代中华大地的社会图景是什么模样？12月9日，记者从国家文物局举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上了解到，古代中国在进入王朝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古国时代，年代为距今5800年至3800年。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介绍，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相比，对古国时代的认识更加深化。

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年至5200年前后，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并确认该遗址第一地点是由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出土的泥塑“女神庙”就坐落在其中一座台基上，这座台基规模宏大，目前残存高度4.6米以上。

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大约为距今5200年至43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开始衰落，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分化进一步凸显，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加强。

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大约为距今4300年至38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王朝时代，其中的考古工作以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这些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三星堆遗址的突破性工作，是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结构，出土文物12000余件（完整器2300件）。研究表明，8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即距今约3100年至3000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001年正式提出，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李群表示，探源工程很多工作还在进行之中，目前的研究结论必然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需要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他表示，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进、深化探源工程，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三星堆遗址6个祭祀坑埋藏于商末周初

测年结果显示，器物生产年代“早早晚晚都有”

12月9日，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介绍，三星堆遗址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以及祭祀区内部的结构，新发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还有大量的遗存遗址，出土了文物12000多件。研究表明，这6个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距今约3100年至3000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常怀颖进一步介绍了更多三星堆遗址考古及研究成果。

▲ 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3号坑提取象牙。

器物坑选址有讲究

考古工作者对于三星堆城址的研究有了新认识，特别是在器物坑的选址方面，有了新的研究进展。考古人员结合考古和环境因素，发现这几个器物坑的选址是在城内南部偏中部的地方，在河的南岸比较偏高的一个台地上。“也就是说，埋藏这些器物选择的地方是有讲究的，是在一个河边偏高的台地上，挖这几个坑，然后来埋藏器物。”常怀颖说。

三星堆遗址形成的年代与三星堆埋藏铜器的年代并不相同。“三星堆遗址形成的年代，可能在相当于二里头时期就有了，这与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有祭祀坑或器物坑的时代并不一样。”他介绍，三星堆遗址铜器出现的年代相对比较晚，并推测铜器可能出现得比较突然，“很可能是受外界的刺激而来的”。常怀颖说。

器物生产年代不同

截至目前，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器物坑已经出土了超过12000件文物，经过数十家学术单位联合组成的科研团队进行的研究，工作人员对这些器物坑出土的文物有了深入的认识，发现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成果。

测年结果显示，遗址的埋藏年代比较集中，是在商末周初这个阶段，但是器物坑里埋藏的器物生产年代截然不同，“早早晚晚都有”。例如，带有长江中游地区风格的铜容器，可能最早追溯到晚商最早的阶段，也有学者认为是洹北时期或者殷墟的偏早阶段，但是它埋藏的时候，可是到了殷墟最晚的阶段和西周最早的阶段。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象牙，这些象牙来自哪里？常怀颖说，“超远距离象牙的汇聚，让中国南部地区或者长江流域的大象，可能经过不同的方式都汇到三星堆去了。尽管（象牙的）年代可能也有早有晚，但埋藏的年代是差不多的。”

▶ 三星堆垮坑拼接的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

通过对三星堆出土的铜器残留泥芯的岩相分析，考古人员发现，三星堆出土的神树、神面具、神兽、神坛与带有长江中游地区风格的铜容器产地不同。目前虽然没有办法直接证明这些神树、神面具是在三星堆本地生产的，但大概率可能指向这个方向。考古工作者推测，可能三星堆本地生产了一批特殊的器物，而铜容器则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地区输入。

此外，对于三星堆纺织品的研究也有一些进展。工作人员通过多学科的结合，用丝蛋白方式（检测）、超景深显微观察，发现三星堆出土的纺织品很多是桑蚕制品，其中主体是绢，也有可能有斜纹制品。

埋藏或是一次性的仪式行为

早在今年6月1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利用三维扫描和3D模型等科技手段，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及文保人员跨坑拼对了两件大型青铜器，分别命名为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

三星堆每一次跨坑“找朋友”，造型惊艳的新器物都备受关注，考古人员结合传统考古学和数字技术发现，三星堆还有一些器物可以跨坑拼合，并据此推测，这些器物在埋藏的时候可能是一次性的仪式行为，将同一件器物打碎后埋藏在不同的坑里。

“公众关心的这些问题，往往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才得到一个阶段性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仍然是阶段性的。”常怀颖说，每一次考古新发现，可能都会带来公众认知和学术认知的一些改变，而且每一次发现有可能又会调整或者改变前一次的发掘认识。他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之中，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契机，多学科联动，改变我们对古代世界的认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代睿 刘可欣 图据三星堆博物馆

“清华简”中首次发现“先秦礼书”

入藏于清华大学的珍贵战国竹简又有新的研究成果。10日在清华举办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成果发布会上传来消息，“清华简”新整理出5篇竹书，均为传世文献未见佚籍。据悉，其中的两篇竹书再现了战国时期礼书的原始面貌，是散失的先秦礼书在战国竹书中的首次发现。

2008年，近2500枚珍贵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此后研究人员对此开展研究。自2011年发布第一辑研究成果以来，清华每年推出“清华简”整理报告，至今已顺利出版13辑，内容涉及经史类典籍、治政之书、天文数术等文献。

本辑整理报告共刊布《大夫食礼》《大夫食礼记》《五音图》《乐风》《畏天用身》等五篇竹书，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礼制、音乐以及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其中，《大夫食礼》与《大夫食礼记》两篇礼书编连为一卷，分别有竹简51支与14支，前者记载大夫食礼中宾主、傧相的行礼仪节，后者记述行食礼过程中执事者行事的具体礼节。

“这是散失的先秦礼书的首次发现，不仅再现了战国时期礼书的原始面貌，而且体现了楚地大夫食礼的一些特点，对先秦礼制以及《仪礼》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说。

此次研究还首次发现战国时期简帛文献中的音乐类文献——《五音图》《乐风》，为中国早期乐理体系以及先秦音乐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中，《五音图》中央绘有一个五角星，其上角对应宫组音名，其他四角对应商、角、徵、羽各组，按逆时针方向依次分布。五角星图形由“宫—徵”“徵—商”“商—羽”“羽—角”“角—宫”五条连线构成，展示了五音生成的规律。

据新华社